

● 胡鸿保 林春 / 著

文野互动

民族考古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 胡鸿保 林 春 / 著

文野互动

——民族考古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野互动: 民族考古文集/胡鸿保等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81108-847-2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民族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3117 号

文野互动——民族考古文集

作 者 胡鸿保 林 春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 数 36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47-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人类学

(代序)

若把 1979 年作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建元年，那么这 30 年人类学的学科走向波折是比较明显的，简单地说，就是从历史学向社会学进行位移。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一些社会科学分支遭遇了一次“改造”和重新定位，还有一些干脆被取消。“文化大革命”之后则又有了所谓“二度定位”^①。经历了这次波动，无论从学理上或者历史渊源上如何解释，民族学和人类学事实上是渐行渐远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陆最早的两个人类学系和一个民族学系相继成立。领军人物梁钊韬、陈国强按心目中理想的“四领域人类学”组建并打造他们的梯队和人类学系，并且认为人类学属于一门历史学科。我们不妨认为此举继承的不仅是所谓“南派”衣钵，而且还留有曾对新中国“民族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民族学的印记。

时隔 30 年后再回首，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人类学状况与梁、陈等先生当初的预设目标有着不小的差距。人类学经受了远比民族学更多的波折。姑且不论官方机构制定的“名录”上如何定位人类学，至少在学界，人类学最出彩也最广受“外行”接纳的乃是它那“参与式”田野作业方法。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① 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60 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教育学、传播学、法学等专家学者跨界来取经，借鉴的主要是“民族志”方法，而难得有人关注人类学的整体论。一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者近期撰文说到，由于功能学派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所以其“社区方法论”已经成为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取向^①。

其实，全球化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明显感受就是流动，所以“族群”完全可以没有共同体质特征、共同历史以及共同地域诸要素，如“向日葵族群”！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三结合的研究法对于“新新人类族群”还能行之有效吗？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30年很短，不过，中国人类学这30年间的波动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的。在分科发展与科际整合两种取向的互动中，我们期待人类学走出一片新天地。

胡鸿保

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2010年5月

^① 黄向春：《中国人类学的南方传统及其当代意义》，载《光明日报》，2009年6月2日，011版。

目 录

民族学与社会史	(1)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3)
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	(18)
《碧血剑》内外所见之满汉族群互动.....	(30)
转型社会中的考古学家——李济个案的社会史剖析.....	(45)
民族调查	(53)
略说拉祜西家庭制度中的母系制原则.....	(55)
元江调查四人谈.....	(66)
学步忆实——从“另类学”到人类学.....	(80)
武陵地区的儒教“堂祭三献礼”	(87)
考古发现与研究	(101)
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	(103)
城背溪·彭头山文化和中国早期稻作农业.....	(122)
红花套史前农人生活——5000年前的一支稻作文化	(138)
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	(148)
鄂西地区三代时期文化谱系分析.....	(179)
鄂西渝东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试析.....	(196)
巴蜀的青铜器与巴蜀史.....	(228)
《宜昌路家河》结语.....	(237)
路家河文化泥片拼接制陶法考察报告.....	(276)
深圳史前遗存所见之文化交流.....	(283)
文物保护	(291)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	(293)

不同的角色，共同的责任·····	(303)
丹江口、葛洲坝、三峡三大水利工程文物保护简介·····	(306)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十问·····	(339)
书评 ·····	(359)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相互渗透：读《美洲土著的房屋 和家庭生活》·····	(361)
追思流金岁月，再现历史真相：读《从清华园到 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随感·····	(367)
跨文化的心灵旅行——读《尼萨》和《重访尼萨》·····	(370)
影视民族学 ·····	(377)
文字 VS 图像——兼谈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	(379)
出入影戏——跨越文本和角色的边界·····	(390)
附录 ·····	(400)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400)
林春的困境——左边是文物，右边是工程·····	(447)
做水利工程文物保护代言人·····	(456)
后记 ·····	(465)

民族学与社会史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从社会学在中国的近百年学科发展史来看，其中始终蕴含着一种人类学的传统。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20 年的社会学“重建”，这种早年的传统也在新的氛围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本文拟扼要考察这种学术传统并尝试对其成因略作分析，以求正于各位同行。

一、19 世纪欧洲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都形成于 19 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使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问題变得突出，愈加引人注目。于是，社会学“作为从整体上和从发展机制上对社会进行综合具体考察的学科就应社会的这种需要而出现了”^①。人类学则出于社会对不同族群（体质形态及社会文化彼此相异的人群）增进理解的需要而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说人类学在 19 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形成，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稍后也含美国）到亚、非、澳、美等洲开拓殖民地有很大关系^②。当然，以上仅仅是指学科形成之初的情形，其“约定俗成”的分野是：社会学以

① 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② 黄淑娈、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3—5 页。

研究工业社会的社会运行为主，人类学和民族学以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异民族社会文化为学科对象。至于民俗学，则是研究本族基层文化（民众知识或民间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残余的。这种不乏欧洲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成为至今仍有学术影响力的传统观念。在东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同行的对话中，我们是不难感受到上述学科起源的历史身影的^①。

二、社会学和人类学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

社会学和人类学同在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对于这两门学科策源地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既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异文化社会，又是一个有别于原始土著人的、拥有优秀古代文明和丰富历史文献的东方帝国。因此，批判地借用两门学科的合理成分来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乃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比如对社会学来说，一方面认识到，孔德一系的社会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对于封建制的中国，它也可以是推动社会改良和进步的一个认知工具或武器；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更成了饱含社会冲突的近代中国的革命理论指导^②。对于民族学或人类学，同样也有一个改造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的过程^③。岑家梧先生当年就注意到了

① 费孝通曾指出，社会学由于“出身不正”、“先天不足”，社会上对它存在偏见。见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② 胡鸿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③ 周星、胡鸿保：《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中国民族与欧洲民族的不同，“在中华民族内，不存在异种人，中国也没有殖民地”，“我们所需要的民族学，和欧美殖民地式民族学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还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出发，剖析论证了“中国化”的必要性^①。比如从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而中国民族学采用此方法则不是为了猎奇，乃是为了在各族文化中求同。李济先生则指出，民族学最初发生的时候是以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就它以后的历史发展看，事实上只限于研究欧洲人所谓文化较低的民族。这就有意无意地建立了一个错误的、以欧洲文化为最高境界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工作的人无形中把这门学问的客观性毁灭了不少，结果是，民族学的好多基本问题都看歪曲了。李济主张，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连我们自己的包括在内，具体的计划就是先从自己的文化以民族学的方法研究起。至于方法，则还是要向欧洲民族学的先进学的，不过自己自然也应该时时刻刻想新的方法，推进这种研究^②。

另外，我们亦注意到张海洋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考证了汉文“民族”一词与西文 nation 等概念的复杂关系^③。他的结论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在 20 世纪初进入中国学术圈又被中国学者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角度。张博士指出，“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话，那么，中国的语言就说明古人思想观念中没有现代民族这一现实……我们考察近代以前的中国时，应该遵从和体验当时的语言规则”；

① 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② 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1939），载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③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年。

“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不需要这个‘民族’[指 nation——引者]”^①。看来，民族自身社会情景的变动乃是人类学和民族学被接纳、进而被改造利用的重要原因。这并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知识的简单移植。

三、吴文藻与中国功能学派的兴起

吴文藻（1901—1985）这位清华的留美博士在学成回国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上下求索”。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吴先生及其弟子们为社会学的本土化作出了不朽的功绩。其中，在引介英国功能学派理论和开展现代社区实地调查两方面成就尤其显赫^②。吴文藻同时还注重培养人才，着眼于学科本身的建设与发展。于是，一方面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经久不散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一批学术魅力长盛不衰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金翼》、《云南三村》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国际同行将吴文藻等誉为

①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年。民族观念形成于族群的互动之中，因此，作为一种参照，我想借用唐德刚先生的一句话为张博士作一注脚：“‘中国’不是像英法德意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 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参见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代序），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② 金天明、龙平平：《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民族研究》，1987 年第 5 期。

“中国功能学派”^①，不是没有原因的。

费孝通晚年缅怀恩师，在纪念吴先生逝世 10 周年的会议上曾有一席讲话，充分肯定了先生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成就，并对先师的人品给以很高的评价^②。费孝通指出：吴文藻认为，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中国史料来填写西方的理论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他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中国，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因为人类学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先生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同时，吴先生还明白，“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是致力于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如今，我们结合学科发展历史研读过来人的切身体会，无非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吴文藻的确是中国功能学派的开山祖，而这一名称本身也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对他们本土化努力与成功的首肯。

四、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或应用研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研究者队伍也补充了新鲜血液。科

① “中国功能学派”一词为费孝通所使用，见费孝通：《功能学派》，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36 页。笔者以为，此词较“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更能贴切地指称该学派而不至于引起争议。

② 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载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际整合的学术趋势以及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学的思想与方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并没有因为社会的现代化而退步抽身，反而在新形势下得到发扬光大^①。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固有的民族社会背景及其置身其中的国际大氛围所使然的。例如，中国境内民族众多，有发展对民族关系和不同地方族群进行社会人类学或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需要；中国地大物博，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之一可能就是从社区个案入手再上升到“类型”及“模式”之间的互相比较；中国在世界诸文明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曾经是较西方文明更具普遍意义的“连续性形态”的代表^②；而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又处于“后发达国家”之列，应当有不同于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这些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我想强调，关注传统的延续时不应该忽视因历史条件不同而出现的变异，不要忘记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1979年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有不少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关注的课题相似，于是就过多地强调其不变的一方面，所谓“一贯坚持”、“终身为之奋斗”之类的字句在学科史的研究著作中并不少见。其实，社会学的“重建”并非“回归”。当前的民族研究中强调开展对汉族的人类学研究，接受《江村经

① 冯小双、李海富：《加强学科建设、回应伟大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②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33—134页。张先生认为：“中国提供了根据西方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加以测试的重要资料。”他又以文明起源为例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济》、《金翼》的学术遗产，都是从扬弃的角度、历史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的，绝对不是跨越 30 年的革命风雨（1949—1978）而不染红尘。尽管也有不少年长的学者说过，要注意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却并未引起年轻学者足够的重视，代沟现象及由此而引发的摩擦时时可见。不过，比较生动的还是结合具体情景引述费孝通先生的话：“一个人的学术思想不可能不反映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况，而且也可以说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是密切结合的，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费先生这番话是在他为其博士生丁元竹的博士论文《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评议书时写下的^①。联系到今天，费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0 多年来的课题路子大体都由他亲自来“破题和引路”，足见传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变异地得以承袭的。

笔者以为，30 年的风风雨雨教会了人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过来之人尤其难以释怀，潜移默化当尽在不言之中。尽管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可是某一种传统却会被迫放弃。学术史家应该善于穿越时间隧道、解读有涯人生的各个时段之间的变与不变。作为一名身体力行者，费孝通今天的成功当中同样包含社会学被取消时期他所经历的种种生活体验。这里我想举一个“反右”、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例子作为佐证。1957 年秋，人民领袖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3 次会议上做了一席讲话^②。在这次讲话中他说到，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做“梁上君子”的危险。其中，他老人家特别点到了费孝通。至少在毛主

①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评议书·丁元竹卷”，第 3 页。费先生的落款日期是 1991 年 6 月 2 日。参见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27—330 页。

②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载《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480—495 页。

席心目中，这位写过《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并没有真正的工人、农民朋友，而在自己的一个知识分子朋友圈子里头出不来，因此吃了亏。1972年春，美国人类学家顾尤勤（Gene Cooper）作为“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第二次友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会谈的机会。当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将他要发表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并寄去一份“会谈稿”时，后者给了他一封联名回信。后来此信连同顾文一起在海外刊出。费孝通等先生在信中重在对顾文中显示出的与自己原意有出入的地方予以辩解，同时也借此表白与旧的自我决裂的意图。他们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都经历过一场自我革命”，“至于你把我们称作‘人类学家’，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过去的称号来接受”^①。这也说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发展的道路是十分坎坷、非常曲折的。

五、“本民族学者”成长的意义

上述吴文藻先生倡导中国现代社区实地调查之举，被功能学派奠基者马凌诺斯基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费孝通晚年回首，归纳其特点在于：“过去人类学者都以文化及经济水平较低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学派则是以本国的经济文化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②当然，《江村经济》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上

① Gene Cooper,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Current Anthropology 14: 480—482.

②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